



李学勤

1933年生于北京，1951至1952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。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、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等，并任国内外多所高校的兼职教授。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、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、历史学科评议组组长、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、首席科学家，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，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。

我国疆土辽阔广大，自史前时代，即有许多人民部族在这片大好河山上活动生息，为缔造中国古代文化作出各自的贡献。进入文明时代以后，更有众多的民族和方国，递兴迭起，使悠久的历史呈现出绚丽的场面。忽视我国历史文化的这种丰富性、多样性，就像用单一的音符谱写天籁，单色的画笔描绘繁花，只能是失去其原有的丰神。

统一本来是历史的一个值得自豪的特点。纵观几千年的古史，统一是经常的、主要的，分裂则是暂时的、异常的现象。有些人主张秦始皇第一次统一中国，这是不够确切的，因为夏、商、西周已经有了统一的局面，秦不过是在春秋五霸、战国七雄的并峙分立之后，完成了再统一而已。长期的统一，为中国文化带来了相当普遍的共通性，由中原以至边远，在很大程度上道一风同，这又反过来使政治、经济的统一更加持久巩固，成为中国人凝聚力的基础。但是，普遍存在的文化的共通性，

多彩的古区域文化

文 / 李学勤

和各地区民族的文化多样性，并不是相排斥的。正是由于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，中国的历史文化才这样丰富多彩。我们研究古代各个区域的文化，既要见其同，也必须见其异。

这里所说的古代的区域，本身便是在历史上形成的概念。早在公元以前，我国已经有一些学者对风土人情作了分地区的描述。司马迁是一个杰出的例子。大家都记得他怎样在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，就全国各区域的特色一一加以分析讲述。比如他说：“……泰山之阳则鲁，其阴则齐。齐带山海，膏壤千里，宜桑麻，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。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。其俗宽缓阔达，而足智、好议论，地重，难动摇，怯于众斗，勇于持刺，故多劫人者，大国之风也。其中具五民。而邹、鲁滨洙、泗，犹有周公遗风，俗好儒，备于礼，故其民颀颀。颇有桑麻之业，无林泽之饶。地小人众，俭嗇，畏罪远邪。及其衰，好贾趋利，甚于周人。”司马迁论齐这一地区，从自然环境、经济条件、历史特点，讲到人民的文化风俗，话虽不多，分析是鞭辟入里的。特别是以齐与相邻的鲁相对比，使齐的区域特点更形突出。

几十年前，有些学者曾对古代区域文化作过有益的探索，例如20世纪30年代对吴越文化的研究，30年代末到40年代对巴蜀文化的研究，是其佳例。近十年来，古代区域文化的研究有突飞猛进的发展。首先兴起的，是楚文化的研究。好多历史、考古界学者，特别是湖北、湖南、安徽、河南等省的研究者们，在楚文化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。他们多次举办学术会议，在刊物上开辟专栏，发表了很多论文，最近又出现了

一大批有关楚文化的专著。随之而起的，有巴蜀文化、吴越文化、晋文化、秦文化、燕赵文化、齐文化等等的研究，或有专书、专栏，或召开学术讨论会，各有盛况，成绩也是很大的。

前些年，我在小书《东周与秦代文明》里，曾提出“文化圈”的概念，想把文献记载和考古成果综合起来，将古代中国划分为若干“文化圈”。1988年初，应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巴纳先生要求，又写了《中国青铜时代的文化圈》一文，引申了这种概念。我的想法，实质上就是提倡区域文化的研究。比如我所说“东方文化圈”，是指今山东省一带区域的古文化，和一般说的齐文化有相近似之处。

下面我们便以“东方文化圈”或广义的齐文化为例，来看一看区域文化研究为什么是必要的。

研究区域文化的重要性，对于考古学来说，是不言自明的。考古学意义的文化，本身就具有明显的区域性质。山东区域的史前文化，最早发现的是山东龙山文化。在很长的时间里，人们是把山东龙山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等混为一谈的。还有大汶口文化，刚发现时也被认为是龙山文化。近年的田野考古工作揭示，山东一带存在着北辛文化——大汶口文化——山东龙山文化——岳石文化的系列。不少学者认为这一系列文化属于东夷，其中岳石文化是由夷人构成的方国的文化。东夷的文化和夏、商文化之间有怎样的关系，尚有待深入研究，但大汶口文化、山东龙山文化至少有两种因素可能对夏、商文化有重要影响，即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符号和山东龙山文化的玉器艺术。

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现已发现八九

种，其中一部分和良渚文化玉器上面的符号是同样的，后者又有若干还没有在大汶口陶器上面发现的符号。这些符号大都可以作为文字来分析辨识，在器物上的位置也与纹饰不同，因而多数研究者认为它们与汉字的起源有关，很可能就是甲骨文之类商代文字的前身。

商代各种器物上最流行的纹饰是饕餮纹（即兽面纹）。追溯饕餮纹的来源，目前可上推到良渚文化、山东龙山文化的玉器。良渚文化的饕餮纹玉器，其纹饰具有带特殊形状的冠、能对分为左右对称的花纹等等特点，和商代饕餮纹一脉相承。山东龙山文化的这种玉器，发掘品尚少，但一些非发掘品的文化性质还是清楚的。其纹饰有和良渚文化共通之处，如有两种不同的颜面并存，和商代饕餮纹也有联系，年代更为接近。商代遗存中的少数玉器，如殷墟妇好墓的一件玉凤，有学者认为实际是山东龙山文化的遗物。

山东龙山文化遗址还出土有小件铜器和铜渣，与商代青铜器的起源也可能有某种关系。对于古代史的探讨，研究区域文化同样是非常重要的。原始社会星罗棋布的氏族部落，固然是分地区的，夏、商、周三代的方国，也各有其地区的基础。以大家了解较多的西周而言，初年的分封诸侯，国数甚多，但是经过不久，诸侯以强并弱，逐渐形成了一批大国，奠定了东周列国的基础，换句话说，即形成了若干自有特点的区域。只有分别详细研究各个区域，才能真正把握古史的消息。

山东一带，在夏代史上即有关键意义。前些时候，我在《古本〈竹书纪年〉与夏代史》文中提到，夏与诸夷的关系，是《竹书纪年》这一部分最重要的内容。据载，帝相曾征伐淮夷及风夷、黄夷，当时于夷来宾。少康时，方夷来宾。帝杼征伐东海，至于王寿。帝芬时，九夷（畎夷、于夷、方夷、黄夷、白夷、赤夷、风夷、玄夷、阳夷）来御。帝芒命九夷，帝泄则命六夷。到

帝发时，诸夷仍宾于王门。这说明，夏代诸王都重视对夷人的统治，而夷人的一部分应活动于山东地区。

商代今山东地区有多少方国，我们所知有限，但从周成王时的叛乱，“三叔（管叔、蔡叔、霍叔）及殷、东、徐、奄及熊盈以略”来看，夷人是商朝的重要依靠力量。武王时，太公封齐，据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讲，目的在于建立和加强对夷人的控制。果然，太公就国，当时便有莱侯来伐，与太公争夺齐都营丘。莱国在今山东黄县，其侯系子姓，即与商朝同姓，而莱人据《齐世家》说乃是夷人。由此不难推想，此后疆域不断扩大的齐国，境内必然包容了许多夷人，就像鲁国、卫国境内有殷民，晋国境内有戎狄一样。我国古代的诸侯国，每每有这样的结构，统治者王朝所封，人民则为不同的族氏或民族，齐国在那时的历史条件下也不能例外。所谓齐文化，正是在这样条件下形成的。

细读文献和现已发现的金文，对夷人的关系可说是姜齐整个历史中的大事。上面提到的莱国，直到春秋时期，才为齐国所灭。现藏于台湾“故宫博物院”的庚壶，铭文详记齐灵公时伐莱之事，可与《春秋》经传合读。事实上，周代齐国内外的形势是颇复杂的，在其周围，既有同姓、异姓的诸侯，又有戎人、夷人的部族。对这一地区进行专门的考察分析，将能揭露很多人们过去不能了解的史事真相。

区域文化的研究，又有利于思想史、学术史研究的深入发展。古代学术思想的流派，常有强烈的地域性，忽略这一点，即难考镜其源流。《宋元学案》、《明儒学案》，多以地名标题，是学派地域性的一种体现，上溯到先秦，情形也是如此。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互有差异，为不同思想流派的产生准备了条件。

齐国的学术思想，前人多强调稷下的研究，实则有几个传统很值得注意：

一个是管子的传统。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所述，管子之政主于“通货积财，富国强兵”，这是贯彻于《管子》自《经言》到《轻重》的一条主线。齐国追随于管子之后的学者，在不同时期受了一些学派的影响，特别是黄老道家一派的作用甚大，致使《管子》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列入道家。经世之法与黄老道术的结合，成为管子之后这一流派的显著特点。

另一个是兵家的传统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有吴、齐两《孙子》。《吴孙子》即今天名闻世界的《孙子兵法》，作者孙武虽仕于吴，原为齐人。《齐孙子》即近年发现的竹简《孙臆兵法》，这个孙臆乃是孙武的后世子孙。《孙臆兵法》和《孙子兵法》等好多兵书一起发现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，墓中还有《尉繚子》，作者曾与梁惠王对话，或说也是齐人。齐人的兵家著作，另外有著名的《司马法》。

儒家在齐地的传流，也形成有特色的派别，后人称之为齐学。例如《春秋》的公羊一家，始于齐人公羊高，随后子孙世代口传，到汉景帝时，公羊寿与另一齐人胡毋子都将之著于竹帛，即今《公羊传》。与此同时，董仲舒为《公羊》博士，著书十余万言，他的思想在西汉思想史上影响的深远巨大，是人所共知的，而追本求源，实出自齐学。

以上所举的都是较古远的例子，区域文化研究的范围当然不限于此。对于汉、唐以下，区域文化研究有更广阔的用武之地，只是由于篇幅限制，这里不能细说了。总之，开展区域文化的探索研究，足以为文史之学开一生面，值得今后继续提倡。不过，分区域的研究不等于把整个中国历史文化割裂，相反地必须以历史文化的综观作为背景，才能透彻地认识各个区域文化的特质，并看到区域文化间如何交流融会，如百川之汇海，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辉煌文化。❶

（原文选自2003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的《中国古代文明十讲》）